

第三批特展善本珍籍杂述

古籍馆善本组 刘明

为了配合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特展，国家图书馆、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编纂了《楮墨芸香——国家珍贵古籍特展图录》，并且从图录中精选了部分藏品向公众展览，是一次难得的观书赏书的机会。布展及在展览期间，我留心听诸位专家前辈的“三言两语”式的关于善本书的说法，也听了李致忠等先生的讲座，将前辈的心得随手记了下来。同时利用值班时间仔细地看了一遍展品，也有些直观的体会，可能不尽准确。草成此篇小文，错谬自然难免，恭请不吝赐教指正。

辽刻本《梵本诸经咒》和《诸佛菩萨名集》，无鱼尾，书口中缝为细黑线，书口版式与北宋刻递修本《文选》比较相近。辽刻本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，无鱼尾，白口。蒙古宪宗六年（1256）赵衍刻本《歌诗编》，无鱼尾，黄永年先生在《古籍版本学》中说这是特例，实际上在北宋时期就已经存在了。唐山市丰润区文物管理所的几件辽刻佛经，对于了解北宋早期蝴蝶装刻书风格提供了很好的实物标本。

宋刻本《京本点校附音春秋经传集解》，卷端题名中有“京本”两字，题跋中常见有“旧京本”之称，当指北宋汴京刻本，言此本源于汴京旧刻。书中有“重言”等黑盖子，将相同的词句注在一起，当是建阳坊刻，科举考试所用的帖括书。宋福州学官刻本《西山先生真文忠公读书记》，刀法与黄丕烈旧藏双陶集的一种《陶靖节先生诗》似有相近之处，福建官刻风格从中可得以体会。此本为丁记，天禄琳琅中的一部仅存甲记。书中钤“礼部官书”长方印，明永乐四年（1406）诏遣郑赐访求遗书，凡所得之书即盖此印。宋刻元明递修本《程史》，清李兆洛旧藏，卷端叶已经是元代改版后的叶子，书口由白口变成了黑口。南宋乾道九年（1173）高邮军学刻绍熙三年（1192）谢雱重修本《淮海集》，谢雱，永嘉人，乾道五年（1169）进士。南宋庆元三年（1197）书隐斋刻本《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》，南宋时诸名家皆有文粹选本，或一家或数家，或一朝诸家，或按地域，源自姚铉《唐文粹》之名。宋刻本《三苏先生大全集》，卷次经过书贾剗改。

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宋刻本《唐僧弘秀集》，李龚辑，十行十八字，与陈宅书籍铺刻本相合，即所称的“书棚本”。台湾“中央”图书馆藏有一部，序后有“临安府棚北大街睦亲坊南陈解元宅书籍铺刊行”二行，北大藏本因序已佚失不知是

否原本有陈氏书籍铺的牌记。李龚又有《剪绡集》，明末毛氏汲古阁影宋抄本。现存宋刻唐宋人集十行十八字者，如袁克文旧藏的宋刻《韦苏州集》，多以为或即书棚本，但也没有牌记可证。疑陈宅书籍铺的板子后有易手的情况，凡易手的板子再刷印时即把牌记挖去。或者当时书坊模仿陈氏书籍铺刻风，当然这些都还是推测。明嘉靖间刻书讲究复古，其刻风与书棚本的刻风有颇为明显的承袭关系。元杭州睦亲坊沈八郎刻本《妙法莲华经》，每版行款同书棚本，刻风亦复相近，似可视为书棚本影响的余绪。

南宋淳熙八年（1181）池阳郡斋刻递修本《文选》，有绍熙三年（1192）计衡跋，经修版补刻，国家图书馆藏本为完帙，且为早期印本，丁钧跋称为“初刻初印”本，实亦略有修补，但在绍熙三年之前。尤袤为官安徽池州时刻印了此李善注本《文选》，池州相传是萧统的封邑，大概自唐代开始当地就已形成了祭祀萧统的习俗，也有一套固定的祭祀仪式，以祈祷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。淳熙八年这一年，江淮地区旱情严重，池州尤为突出，于是刻了这部书藉以祭祀萧统。宋刻本《六臣注文选》，有“恭父”印，此印亦见于宋刻《荀子》中，即明孙朝肃之字。此本清末曾流于琉璃厂谭锡庆正父斋书籍铺，后来又到了徐坊手里，徐坊曾任京师图书馆副监督。顺便提一下，谭锡庆藏有两部宋刻《六臣注文选》，此其一，另一部是赣州本。

宋刻本《太学新增合璧联珠万卷菁华》，康生旧藏，乾隆五玺之“八征耄念”、“太上皇帝”皆无“之宝”二字，较罕见，缘于印章形制不同。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题（宋）李似辑，山东省图书馆藏本有书序，题南宋建炎二年（1128）连江后学李似之，当改为李似之辑为是。《中兴以来绝妙词选》录有李似之的词作，名弥逊，自号筠翁，南宋初期名士，因不附和秦桧遭贬。宋刻本《妙法莲华经》，元至正元年（1341）高仲文刻明修本《文章正宗》，两本都是清宫藏书，前者为秘殿珠林所藏，后者则为天禄琳琅所藏，皆钤“乾隆御览之宝”椭圆形朱印，但盖的有章法。卷轴装的比如佛经卷子，盖在卷一题名的右上方；蝴蝶装的本子盖在书口中缝处，“御”的中笔恰与书口中线重合。而线装的本子则一般盖在卷端叶上方中间的位置，压住上栏线，上栏线内外基本对半，“御”字的中笔亦基本与取中的栏线相合。明铜活字蓝印本《毛诗》，原本是线装，但修复后变成了类似蝶装的装帧方式，这样一来就改变了盖“乾隆御览之宝”之印的章法了，似乎

还是恢复为线装为好。

宋刻本《五灯会元》与陈清华旧藏十卷残本《五灯会元》应是出于同版，卷端叶书口镌刻的本版字数都是相同的，前者有淳祐间序，后者有宝祐间序，淳祐、宝祐前后相接，当是初印本与后印本的关系。蒙古刻本《尚书注疏》，此本的版式刀法与张存惠晦明轩刻本《重修政和经史证类本草》相类似，有“应召珍藏”朱印，即季振宜之子季应召，宋元善本中偶见其藏印。

元刻明修本《监本附音春秋谷梁传注疏》，十行十七字，与元刻明修本《十三经注疏》同，属于十三经本的零种。卷端所题监本，并非真监本，书坊据监本而刻，真监本卷端罕见有题“监本”者。《十三经注疏》刻于闽中，所用的书版子基本上都是书坊翻刻监本诸经，大部分为元刻，但也有宋刻。明嘉靖李元阳刻南明隆武二年（1646）重修本《十三经注疏》，九行二十一字，已非旧本格式，判断《十三经》零种的方法便是看行款。

元天历二年（1329）崇化余志安勤有堂刻本《四书通》，书中凡胡氏之说，标以阴文“通曰”。元詹氏进德书堂刻本《大广益会玉篇》，书中凡校勘异文标以阴文“或作”，清许乃普旧藏，叶昌炽《藏书纪事诗》失载。元刻本《资治通鉴》，有“钱受之读书记”印，钱谦益曾读过，倍显珍贵。下方两印古色苍郁，傅氏不知谁家，当是此书的第一位收藏者。元至正二十三年（1363）吴郡庠刻本《通鉴总类》，山西籍藏书家张敦仁旧藏，通晓算术，有二子曰张荐棗、张葆采，继承其父藏书。元刻本《新编方輿胜览》，书中凡“某某路”大字占两行，其上刻“○”，凡“某某府”低一格亦大字占两行。右下角“香山草堂”印，古香馥郁，惜不知出于谁家。元后至元三年（1337）刻本《类编阴阳备用差谷奇书》，卷端题名大字占两行，有“庆嘉馆印”，又见于明初刻本《覆瓿集》中，不知出于谁家。元刻明修本《新入诸儒议论杜氏通典详节》，国家图书馆藏有宋绍熙五年（1194）择善堂刻本，清宫天禄琳琅旧藏。元至元二十三年（1286）以择善堂本为底本又翻了一部，书中还保留着没有删削干净的宋讳字，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。此本与北大藏本应该属于同一版摹印。元刻明修本《纂图互注荀子》，元代六子本的一种，宋代先有四子本，后来出现六子本。元刻本《太平金镜策》，语涉圣上皆提行空格。

明洪武三年（1370）王氏勤有堂刻本《贞观政要》，“正庭”印即汪雅庭骏昌，

长洲汪士钟族人。明洪武三十一年（1398）蔡伯庸刻本《高季迪赋姑苏杂咏》，“海丰吴重熹印”即吴式芬之子，山东无棣人。明刻本《古今书刻》，书中内府刻书竟列《永乐大典》，似于体例不符。明成化十年（1474）刻本《养生类纂》，“世贞”印文拙劣，疑伪印，“范印承谟”即范文程之子。明嘉靖吴郡沈辨之野竹斋刻本《诗外传》，有“愿读人间未见书”，即顾祖禹藏书印，值得玩味。明嘉靖六年（1527）司礼监刻本《大学衍义》，明初刻书以大黑口为主，内府司礼监刻书至嘉靖尤然。明嘉靖七年（1528）蒋暘刻本《至大重修宣和博古图录》，钱曾在《读书敏求记》中称“重修”不解“所修何事”。国家图书馆藏有一帙元刻明修本，清嘉庆间天禄琳琅旧藏，卷端题“宣和博古图录”，无“至大重修”四字，以之与元刻至大重修本对校，有异文，至大重修本很明显地将前本版中存在的误处改了过来，至大重修本当是改版后的印本。为了区别旧刻，而在卷端题名中补刻“至大重修”四字，两本是初印本与后印本的关系。明代诸刻“至大重修本”基本上以元刻“至大重修本”为底本，但行款已有变化，彝器图幅也变小了。此本为明潞藩朱翊鏐旧藏，有“潞国世传”一印，形制殊为罕见，此印又见于明刻本《礼记集说》中。明嘉靖十四年（1535）楚藩崇本书院刻本《刘氏二书》，卷端题名大字占两行，“南昌彭氏”、“知圣道斋藏书”为清彭元瑞藏印，曾经手编撰《天禄琳琅书目后编》，经眼善本书颇多。明嘉靖四十四年（1565）王廷刻本《子昂集》，黄丕烈跋称未知之本，流传罕见。明隆庆二年（1568）崔近思刻本《扬子法言》，明赵大纲集注，山东滨州人，又尝注杜诗成《杜律测旨》，是现存第一部山东籍人士注杜的本子。有“王印金铎”、“湛庐”两印，杭人王金铎藏印，知名藏书家，惜藏书事迹翳如。明万历二十一年（1593）金陵胡承龙刻明修本《本草纲目》，第三部金陵本，弥足珍贵。

明内府抄本《书传大全》，十行二十二字，与刻本相同，当是刻《书传大全》所用的底本。明影宋抄本《史记》，九行十六字，与宋绍兴淮南路转运司刻本相同，当是据转运司刻本影抄。清初刻本《水浒叶子》，国家图书馆藏本为翻刻本。清道光二十二年（1842）吴氏筠清馆刻本《筠清馆金石文字》，王筠、吴式芬批校，尹彭寿跋，三人俱鲁人，皆从事金石文字之学。

以上只是些粗浅的直观性的体会，说的不对或不妥的地方请大家多多海涵包容！